

关于民族资本现代企业发生问题的讨论

——续一封没有写完的信

汪敬虞

1964年4月至5月间，邵循正先生在《光明日报》《史学》双周刊第283和284号上，发表了一篇《论郑观应》的长文。我当时读了以后，曾经写过一封信，打算向邵先生请教。信没有写完就搁下了。最近整理旧稿，偶然发现这半截子信稿，觉得还值得续下去，并且把它发表出来。然而邵先生已经作了古人，我再想向他请教也没有机会了。这真是十分遗憾的。

信的原文如下：

邵先生：

我拜读了大著《论郑观应》，得到不少教益。大著中指出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并可能有一定程度发展的好时机”。然后引用了1881年郑观应上李鸿章的一个禀帖中关于香港之制糖、广州之纺纱、牛庄之榨油和上海之缂丝的一段话，说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民间一些小型新企业的产生”情况，并且肯定郑禀中“所说香港制糖，显系华商企业。广州机器纺纱，只能是旧式工商业者的投资。最早的牛庄榨油和上海缂丝也都是中国商人独立创办”。而他们的“亏耗夭折”又是由于“这些创始者困于资本不继、政治上又无保障，不能抵抗外国资本主义（包括通商口岸的洋行）的压迫，因而不能维持。”从而认为“这正好说明，中国社会中原来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当时有所发展而又不能成长的情况和原因。”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论点。但是，郑观应所提供的这一段史实，却是不能用来支持您这个论点的。

郑观应禀帖中提到的这几项工业，都是什么样的工业呢？实际上它们都不是“民间一些小型新企业，”而是最早入侵中国的外国企业。它们的“亏耗夭折”都有各自的原因，和“不能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是不相干的。为了供进一步的研究，我现在提供一点自己接触到的材料，请您指教。

首先看看郑禀中所说的“香港之制糖”指的是什么。

香港最先出现的一家糖厂，是设立在东边山（East Point）的精糖厂。

还在六十年代末期，英国商人曾经试图在广东的香港、汕头和黄埔等地设立机器糖厂^①。其中在香港和黄埔的活动，还纠集了一批中国商人^②。但是，这些企图都遇到来自中国手工榨糖者的强大阻力。黄埔的糖厂，根本无从立足，汕头的糖厂计划，在八十年代以前也同样没有实现。只有香港一处虽然利用英国的保护，在这个岛的东边山设立了一家由中国股东参加的精炼糖厂，但是包括糖商在内的中国手工制糖业者拒绝出卖蔗糖，使这家精炼糖厂缺乏充足的原料供应。那些有糖商参加的中国股东，也只是想到怎样从供给工厂的原料中去牟求利益，而不去指望销售成品的利润。结果是工厂在市场上根本买不到价格相宜的原料，经营不到一年便宣告停摆^③。1874年在英国汇丰银行的资助下，这家糖厂，再度恢复筹办^④。1877年又转到英商怡和洋行的手中，并正式成立公司，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华火车糖局。（China Sugar Refining Co）^⑤

从这一段简短的历史可以看出：郑观应所说的“香港之制糖”，显然指的是这家外国糖厂。他说，在所有各项工业中，“惟香港之糖近年颇有东洋销路，而前此亏已不貲”，前一句是符合中华火车

① Trade Reports, 1869年, 汕头P. 88; Herald, 1870年9月29日, P. 243; 1871年8月25日, P. 639.

② Herald. 1870年9月29日, P. 243; 1871年8月25日, P. 639.

③ Herald, 1872年5月18日. P. 385.

④ Celestial Empire, 1874年9月5日P. 229; Herald, 1875年3月11日, P222-223.

⑤ Daily News, 1878年6月7日, P. 527.

糖局成立以后的情况的。因为根据当时的记载，这家糖厂在五年之中，日产量就提高了一倍以上，^①有了大量的出口。而“前此亏已不貲”则显然指的是怡和洋行接手以前的情况。

香港有没有纯粹中国商人创办的糖厂呢？有的。1883年成立的利远糖厂，就是完全由一批中国商人组织起来的。但这些人却不是“旧式工商业者”，而主要是一批洋行买办或买办化商人。如著名买办徐润就投下了三万两资本。^②而且，它的成立，是在郑观应条陈上述禀贴之后，它的存在，不过三年。1886年就被中华火车糖局吞并。^③因此，它不是郑观应禀贴中所指的糖厂，这可以肯定。

其次，再看“广州之纺纱”。

广州之有现代化纺纱工厂，是晚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事情。^④但是，郑观应说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广州曾经出现过纱厂，还是有事实根据的。因为在1871年下半年，广州的确一度出现过一家小型、但是使用机器的纱厂，这就是一个名叫富文(Vrooman)的美国人创办的厚益纱厂。富文是一个长居广州的美国商人。这个工厂从筹办的第一天起，就有中国人投资。纱厂的机器，就是由他的“华友”和他一起集股自旧金山买来的。而广东行商伍绍荣据说曾经是富文的老朋友。^⑤

工厂是1871年7月初开工的。^⑥它的全部纱锭，不过一千二八百十枚。^⑦即使日夜开工，也只能纺纱八百磅。^⑧尽管如此，它却吸引了一些中国商人的注意。据说，它的股票，一开始还出现过40%的升水。^⑨

但是，这个工厂开工不到半年，便停工了。原来富文虽然到

① Herald. 1883年3月28日, P.340.

②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1927年, 82页。

③ Herald.1886年2月17日, P.172; 3月10日, p.252, 1887年3月16日, P.300.

④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955年, 366页。

⑤ 《教会新报》,1873年9月6日, Herald,1872年5月18日, P.391.

⑥ Herald.1871年7月7日, P.503.

⑦ 《教会新报》1871年10月28日、1873年9月6日。

⑧ Herald.1871年7月7日, P.503.

⑨ Herald.1871年4月22日, P.260.

处为他的工厂宣传，自己却没有什么资本。工厂开工以后，一切费用，全靠中国股东垫支。而工厂生产效率低下，资金周转失灵，以致订机的款项，不能及时还清。就在这个当口，美国驻广州的领事却以公司的订机欠款为由，扣押全部机器。^①富文先是宣告停厂，后又要求他的老朋友伍绍荣的家族接办，而以增加资本偿付机价为条件。^②但是，交易没有成功，最后只得将机器拆散拍卖完事。而中国股东的资本，却从此不见着落了。显然，郑观应所述“广州之纺纱”，指的就是富文创办的这家既有华商附股、又要求行商家族接办的纱厂。尽管它和中国商人有这样密切的关系，但它不是“中国商人独立创办”，这是明白无误的。

“牛庄之榨油”，基本上是一样的情况。

出现在牛庄的第一家机器榨油厂，从这个港口开埠的1861年起，就在入侵这个商埠的外国人中间，开始酝酿。首创者是一个名叫普拉特(Thomas Platt)的英国商人，而资本则主要靠怡和洋行周转。工厂于1866年开办，1867年就转到怡和手中。^③第二年正式开工，但是，同样由于当地的中国大豆中间商人的抵制和厂内工人的反抗，这个工厂只存在不到五年的时间，便于1873年秋天停止营业，出赁给本地一家商号。^④从此以后，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牛庄不再见有第二家榨油工厂。

因此郑观应所说的“牛庄之榨油”显然是指怡和洋行出售给中国商人的这家油厂，而非“中国商人独立创办”的油厂，这也是没有疑问的。

至于“上海之缫丝”，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以前，也就是在郑观应写这个稟帖以前，一直掌握在外国资本家手里。其间先有1861年英国怡和洋行的纺丝局，^⑤后有1867年美国哥立芝洋行

① Herald.1872年2月15日，P.122；4月4日，P.262。

② Herald.1872年5月18日，P.391。

③ Daily news, 1868年10月29日，P.4707。Trade Reports, 1868年，牛庄，P.7。

④ Commercial Reports.1873年，牛庄，P.71。

⑤ Shanghai Almanac, 1861年。

(Ezra R. Good ridge & Co) 的缫丝厂^①和1878年美国旗昌洋行 (Russll & Co.) 的旗昌丝厂。^② 中国商人自办缫丝工厂, 是从八十年代初期才开始出现的。首创者是1882年开工兴建的公和永丝厂, ^③ 这个丝厂的主人是一个和外国洋行关系极为密切的大丝商。^④ 继公和永之后, 是一家由洋行转手的公平丝厂。创办这家丝厂的公平洋行 (Iveson & Co.) 在开办之初, 就吸收了 中国丝商的股份, 经营不过三年, 即由中国人接手租办, 后来终于转到中国人手里。^⑤ 这些情形, 当然都是郑观应写稟帖时所不及见的。但中国买办商人附股外国丝厂, 在此以前, 即已存在, 因为1878年创办旗昌丝厂的旗昌洋行, 从第一天起就吸收了华商资本。

从以上的事实看, 郑观应稟帖中所说的几项工业实际上都不是“中国商人独立创办”的企业。它们或者是外国洋行的企业, 不过其中渗杂有中国人的股份, 或者原来是外国洋行的企业, 后来转到中国人的手里。

原信写到这里停住了。现在面对着半截子信稿, 当半想向邵先生请教的内容, 忘了大半了。但是, 我还是想把这封信续完。当然, 现在是无法向邵先生投递了。续文如下:

邵先生:

我为什么在您的一篇全面论述郑观应的大著中单单提出无关全文宏旨的郑观应稟帖中的一段话而加以烦琐考订呢? 原因是: 这段话在郑的稟帖中不过说明当时新式企业创业的艰难, 不说明别的。而引用到大著中, 就涉及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道路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您在大著中说: 郑观应稟帖中所说的企业, 都是“民间小型新企业”, 这些企业“都是中国商人独立创办”的, 只能是“旧式工商业者的投资。”而您又把这些“民间小型新企

① G.C.Allen, *Western Enterprise in far Ea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1954年, P.65.

②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 special series.No.3.silk.1831年, P.79.*

③ *Herald.1882年1月17日, P.63.*

④ *Herald.1902年7月16日, P.131.*

⑤ 《申报》, 1885年3月20日, 《中外日报》, 1901年5月23日。

业”作为民族资本企业的代表看待。这就逻辑地规定了中国民族资本企业产生的道路，都是“中国商人独立创办”，只能是“旧式工商业者的投资。”然而，如果上面的那点考订基本上合乎事实，那么，您也许会同意，您的这个立论，似乎就有商量的余地。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有大的和中小不同，也就是有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区别。但是，承认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资本的同时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它的产生，也沿着截然不同的途径。也就是说，要看到过程的复杂性，不能简单化，一刀切。

然而，长期以来，有这样一种在我看来属于一刀切的观点，他们认为洋务派官僚的企业活动，这是官僚资本的形成过程。洋行买办的企业活动，这是买办资本的形成过程。而民族资本企业的产生，正如您所指出的，只能是“中国商人独立创办”，只能是“旧式工商业者的投资。”这就是说，既然存在的性质截然两样，那么，产生的途径，亦必泾渭分明。我一向不是那么看的。

我在1962年就提出过：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的产生，经历了三种不同的途径，也可以说是三种不同的类型。我以缫丝工业为例，说明在中国民族缫丝工业的发生过程中，既有纯粹商办缫丝厂的设立，也有洋行买办附股外商丝厂和洋务派官办丝厂的转化。^①而这三种途径，带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在事物的过程中，分化和转化，带有普遍性。这一点，我现在还是这么认识。

洋务派企业的经营过程，是不是中国官僚资本的形成过程？从一个角度上看，也可以这么认为。但是，重要的一点是：应该同时看到它的分化。这一点，我在1963年向您请教有关上海机器织布局的问题时，就已经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在那里，我说：“把洋务派的官办或官督商办以及官商合办的企业的经营过程，单纯地看作是**中国官僚资本的形成过程**，这是不完全符合客观的历史实际的。洋务派大官僚的确通过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等方式给自己积累了大量资本，他们的资本积累和民族资本的

^① 《学术研究》，1962年6期。

发展，处于对立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看，洋务派企业的经营过程，也是中国官僚资本的形成过程。在这里，我和邵先生的看法，是一致的。不一致的地方，在于是不是同时注意到它的分化。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产生，看来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纯粹商办的是一种，由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而转化的是另一种。当然还有一种不可忽略的形式，是买办依附于洋行的企业的转化。”^①既然前一种在那篇向您请教的拙文中作了比较详细的申述，现在，我想只着重说一说后一种转化，也就是买办附股洋行企业和民族资本企业产生的关系问题。

这一点，在您的大著中，也有明确的意见，那就是：民族资本企业“不可能依附洋行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不可能从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中派生出来。”和您一样受到我的尊重的一位经济史专家向我提过类似的意见。他说：买办投资于哪一个企业“只能意味着那个行业的买办化，而不是买办资本的民族资本化”。“不能把买办资本投资的那些企业视为买办资本的民族资本化，这是可以肯定的。”

我是不能肯定这个意见的。

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发生时期，买办投资现代企业，有两种情况，一是附股洋行的企业，一是投资于非洋行的企业。

买办投资于非洋行的企业，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投资于洋务派的企业，一是投资于非洋务派的企业。

投资于既非洋行、又非洋务派的企业，应该直截了当地说：这就是投资于民族资本的企业，换成“买办资本的民族资本化”我看也未尝不可。

买办投资于洋务派企业，情况自然不同一些。它既涉及到官僚资本的形成，也涉及到民族资本的转化。这一点，我在前面提到的那篇向您请教的拙文中已经作了说明，这里不再详述。

值得讨论的，是买办附股外国洋行的企业。

买办附股外国企业，分润国外资本的剥削余羹，这当然意味

^① 《新建设》1963年8月号。

着买办资本的积累，反映中国经济买办化的加深。在这一点上，您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我所尊敬的那位老专家的意见，也是正确的。但是，就是在这里，也要同时看到另一面。原因是，买办附股外国企业和买办集资自办企业二者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井水不犯河水的，而往往是有一个先后相承的过渡。且不说其他的情况，单是上面提到的公平丝厂之由中国人的附股到租办以至最后的转为自办，这中间就可能找到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过渡的蛛丝马迹。情况的复杂有时超出了我们的想像。这里不妨仍拿郑观应禀帖中提到的榨油工业，作进一步的分析。

上面提到，六十年代出现在牛庄的一家由怡和洋行出资经营的榨油厂，是中国境内外国资本经营的榨油工业的第一家。而根据现有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国民族资本经营的第一家榨油工厂是1879年出现在广东汕头的一家豆油豆饼厂。^①这两个工厂是否就井水不犯河水，一点关系没有呢？不是的。原来汕头这家所谓民族资本经营的豆饼厂，主要的主持人就是汕头怡和洋行的一名买办。而它的创办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汕头附近种植甘蔗所需之豆饼肥料，以保证汕头怡和洋行的一家糖厂的甘蔗原料的需要。发人兴味的是，被称为外国资本的牛庄怡和洋行油厂，也是由一名来自汕头的买办，主持其事。^②而被称为民族资本的汕头豆饼厂的创立，恰恰又在牛庄榨油厂停业推盘之后。我们现在还不能判明两家油厂是否就是同一买办主持，但是，它们最初都附丽于怡和洋行，这是可以肯定的。而两厂最后都转到中国人手里，又是不移的事实。因为牛庄油厂在成立五年之后，就出让给本地一家商号，这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已经看到。而汕头豆饼厂在经营三年之后，就被人称为“全由中国人经营”的企业，这是当时英国驻汕头的领事的亲口报告。^③

①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957年，1012页。

② S. R. Brown, *Cakes and oil,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hinese soybean Processing 1860—95*,载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③ *Commercial Reports*, 1882年，汕头，P.113.

您说：民族资本企业“不可能依附洋行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不可能从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中派生出来”这似乎是无可争辩的真理。否认这一点，似乎成为荒诞，因为，乍看起来，它简直是在美化资本帝国主义。但是，民族资本的软弱，不正是由于它不依附外国侵略势力就依附国内反动势力吗？它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始终在这样一种条件之下吗？至于“从侵略势力中派生出来”，要看怎么理解。如果把问题缩小到民族资本的最初产生，从依附侵略势力的买办势力中，的确是可以派生出来民族资本的。

争论这一点有什么意义呢？有。因为这证明了“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这种软弱性，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洋行剥削的联系和它“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的联系，至少具有同等的地位。

您在大著中，还提出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即民族资本现代企业不但“都是由中国商人独立创办”，而且“只能是旧式工商者的投资。”我认为这也是和历史的实际情况，不相吻合的。

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以后、中国资本主义企业产生以前的三十年中，中国封建社会中原有的各种旧式工商行业，发生了不同的变化。有的受到资本主义的冲击和排挤而趋于衰落，有的转而与外国势力或封建政权发生联系，因而能够维护自己的原有地位，甚至还有所发展。趋于衰落的和有所发展的不同，有所发展者之中，与外国势力发生联系的和与封建政权发生联系的也不同，即使在同一行业中，不同地区、不同集团乃至各个商人彼此之间的际遇也不能完全一致。因而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发生时期，不同的行业以及同一行业中的不同集团和代表人物，在对待资本主义企业的问题上，也有种种不同的态度，需要区别种种不同的情况，同样不能一刀切。

沿海运输业中的沙船和城市金融业中的钱庄，在外国势力入侵后，面临着两种不同的遭遇。沙船业在外国轮船排挤打击下，有明显衰落的趋势，而钱庄则适应西方国家商品入侵和原料掠夺

的需要，很快受到外国侵略者的利用，得到一定的发展。原来是封建社会产物的钱庄，这时又接受入侵中国并破坏中国原有经济结构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哺育，因而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之际，有相当一部分企业资本由钱庄业的利润转化而来也就成为很自然的现象。

在同一行业中，也有不同的际遇。同属旧式金融业的票号和钱庄，在其和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关系上，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钱庄在适应入侵的资本主义的需要走上为它们服务的轨道时，票号却步入结纳权贵为封建政府服务的道路。它虽然保持一定的商业活动，但它同官府的联系就其重要程度而言，显然超过了它与商界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票号的财东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到怎样维系它在封建政府中的地位，对于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投资，失去了与他的财力相称的兴趣。

在同一行业的不同集团之间，也出现不同的际遇和表现。就拿受到外国资本主义打击和排挤的沙船业来说，应该看到，并不是所有的沙船老板，都对新式航运企业抱着敌对的态度。轮船招商局的首创者朱其昂就曾是有名的沙船主。但是绝大部分沙船商人不但没有投资，而且采取了敌视态度，这也是事实。见之于当时记载的是：许多沙船业者一听说招商局招股，“群起诧异，互相阻挠，竟至势同水火”。^①为什么同是受到外国轮船排挤，力图挣扎自存的沙船业者却为自己安排了不同出路呢？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有各自不同的际遇。主持轮船招商局的朱其昂，虽然是一个沙船业的世家，但他自己却“习知洋船蹊径”，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旧式沙船业者。在倡办轮船招商局以前，他在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各地设有华裕、丰汇等银票号。^②在创办招商局的前后，又和外国轮船公司发生了一定的联系，结识了许多大洋行的买办。^③而他之所以出面主持招商局，也正是由于得到买办商人的支持。由此可见，朱其昂的际遇，是不同于大多数沙船业者的。

① 《沪报》，1883年11月10日。

②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1908年，卷41，38—40页。

③ Herald，1875年8月28日，P.213。

在以往有关轮船招商局的讨论中，曾经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朱其昂自己是旧式商人和运输业者，并不是买办，而入股的人，也不可能有依附洋行的买办。在我看来，朱其昂虽然不是买办，但决不可能看作纯粹的旧式商人。至于最初入股招商局的人当中即便没有买办而全是沙船业者，估计也多是和朱其昂有类似经历的殷实船户，倒是那些纯粹的旧式沙船业者，他们惟恐轮船夺去“沙宁船之生意”，对新式轮船是“势同水火”的。

我还想进一步指出，这种“势同水火”的局面，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第一天起，就可以清晰地看到。

还是拿郑观应稟帖中提到的几项工业来看吧。

在制糖工业中，正如上面看到的，最早出现在广东地区的外商活动，都受到包括手工榨糖业者在内的“旧式工商业者”的反对。而香港的第一家外国糖厂，不但受到“旧式工商业者”的抵制，甚至那些附股的中国糖商，最初显然也是着眼于维护他们原来的利益，和外国资本家处于貌合神离的地位。

在棉纺织工业中，广州的“旧式工商业者”对厚益纱厂的反应，虽然不见记载，但是，在上海，西方资本主义入侵者在这方面的活动，几乎都遇到来自中国“旧式工商业者”的抵制。一直到七十年代后期，以上海布业公所为代表的“旧式工商业者”对所有西方侵略者在上海的设厂活动，不但“绝无顾而问者”，^①而且事先作出抵制措施，“禁止贩卖机器制造的布匹”。^②

缫丝和榨油工业中的情形，表现得更为突出。在牛庄的榨油业中，怡和洋行的榨油厂受到手工榨油业者和中间商人的双重反对。他们的反对，使得这家榨油厂根本“不能在和本地豆饼作坊同样便利的条件下购得大豆”。^③而当工厂企图绕过中间商人直接向豆农采购时，几乎是“整个中国社会都起来反对”，油厂老板想在当地商人中间“找一个有地位的人”帮他一帮，但是一直到工

① 《申报》，1879年3月21日。

② Commercial Reports, 1877—1878年，上海，P. 17—18，

③ Trade Reports, 1866年牛庄P. 107，

厂关门的那一天，他始终找不到一个肯于帮忙的“合伙者”。^①

怡和洋行在上海的缫丝厂，面临着同样的情景。它甚至在市场上以所谓“公平的价格”也得不到它所需要的蚕茧，^②当它试图向产区直接收购蚕茧时，又遭到本地手工缫丝业者和收购手工缫丝的中间商人这些“旧式工商业者”更加强烈的反对。^③情况尖锐到这种地步，使得丝厂收购生丝只好由洋行老板亲自上阵。^④连买办都靠不住，更不用说取得“旧式工商业者”的合作了。

这个时候有没有“中国商人独立创办”缫丝工厂呢？有。如今为大家所熟悉的广东南海的继昌隆缫丝厂，就是在此之后不久的1873年创办的。但是，人们也都知道，这家丝厂的创办者，恰恰不是纯粹的“旧式工商业者”，而是一个和资本主义世界有过相当长期接触的华侨商人。

“旧式工商业者”对外国入侵的资本主义企业，采取抵制的态度，这无疑有利于反对外国的侵略。但是，同样没有疑问，这种态度，注定了“旧式工商业者”不能构成同时发生的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相反，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时期，对资本主义企业产生兴趣的，就其主要构成分子而言，倒是那些从“旧式工商业者”的圈子中跳出来同洋行打交道的买办化商人或者原来就在洋行滚过一段时期的买办。

这不是有点奇怪吗？不又是在美化买办吗？不。不是这样。

买办之所以最先投资于资本主义现代企业，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最先接触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是他的资本，最先享受了这种剥削方式的“果实”。他的资本运动和他的主人——洋行老板的资本运动，保持亦步亦趋的关系，追求最大利润的原则，在作为外国掠夺者的工具的买办资本身上，同样发挥着支配的作用。作为外国侵略者扩大商业和贸易掠夺的工具，买办在分取佣金之

① S. P. Brown. 上引文。

② Commercial Reports. 1872年，上海，P. 145.

③ Herald. 1872年5月25日，P. 408.

④ S. R. Brown. The Ewo Filature. A Study in the transfer of Technology to China in the 19th Century, 载Technology and Culutre, 1979年7月，p. 558.

外,还建立了自己的商业机构,从中分取更多的商业利润。当外国侵略者从流通领域扩大到生产领域,从商业、贸易掠夺扩大到资本掠夺的时候,买办也自然而然地在附股外国企业之外,又建立起自己的企业,从而取得更多的企业利润。买办资本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的转化,从附着于外国企业到自办企业的转化,这并不是出于什么买办的爱国心或民族感。但是,它代表着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化,这也可以说是“买办资本的民族资本化”吧,无论如何,这是历史的进步。

邵先生,您说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工业都是由“中国商人独立创办”的,“只能是旧式工商业者的投资”。您心目中的模式,也许是十八世纪中叶英国的模式。的确,那里的“商人直接成为工业家”,可以说是“独立”地进行的。他们的身份,相对于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家而言,也可以说是“旧式工商业者”。但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已达30年之久的半殖民地中国,这个模式几乎是不存在的,或者说至少是有很大的改变的。在这个条件之下,如果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也算一顶桂冠,那么,洋行买办以及和洋行有较多接触的买办化商人,反而比纯粹的“旧式工商业者”更有资格戴上这顶桂冠的。当然,更确切一点说,这指的是您所说的那个时期,即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发生时期。

到此为止,我要请教的问题,基本上都说到了。当然,你的大著,内容丰富,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很多。例如,您还提到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中原来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当时有所发展而又不能成长的情况”这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本来还想谈一点自己的看法,请您指教。上文也间接略有涉及。但要正面论述这个问题,三言两语是说不清的。只好暂时打住。

上面所说的,肯定有很多错误。遗憾的是,这封信您是看不到了,即使有再多的错误,也得不到您的指正了。但您那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认真的求是精神,仍然激励着人们探索的勇气。这也是我终于续完这一封信的力量之所自。